




从青铜器族徽看夏人后裔与商周族群的融合认同*

雒有仓

摘要:在夏商之际的族群迁徙与融合过程中,商人不仅沿袭了夏人创造的青铜合范铸造技术,而且继承和发展了青铜礼制以及铸刻族徽的文化习俗。青铜器铭文记载的夏人后裔主要有杞、虎、费、郟、繁、戈、辛、山、眚、鲍、苏等国族,其中可以确定的姒姓族徽有眚、戈、辛、虎、山、等六种。夏人后裔与商族的融合主要表现在族徽、日名以及丧葬习俗上的文化认同,而与周族则更多的表现为通过联姻实现了彼此血缘上的融合认同。夏商周三族融为一体的标志是体现单一家族组织的族徽最终消亡,其时代应在春秋早期。

关键词:夏人后裔;青铜器族徽;族群认同

中图分类号:K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0)02-0024-10

夏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也是华夏族形成过程中最早出现的族群,但因史料缺乏,人们对其历史所知甚少。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人们寄希望于地下考古发掘资料揭示夏史原貌,先后在豫西、晋南等地发掘二里头文化遗址百余处^①,同时以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相结合不断探索夏代历史文化^②,或通过古文字资料辨析论证夏朝存在及夏文化^③。但是,这些研究都侧重于夏王朝建立统治的时期,较少关注夏灭亡后夏遗民境况及其铜器材料^④,对于夏人后裔与商、周族群的融合认同研究尚欠深入。本文不揣鄙陋,拟对这一问题略作讨论,希望有助于全面认识夏文化及其在商周时期的遗存。

一、夏商之际的族群迁徙融合与青铜文化传承

夏商之际,中原地区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剧烈变化。商汤灭夏后,由于政权更替,中原地区

的族群结构出现了较大变动。在豫西、晋南的夏人聚居区,由于商人征服战争的推进,许多夏王室贵族及其附属的族众纷纷外逃或迁徙,由此引发了令人瞩目的族群大迁徙。按照文献记载,这次族群大迁徙主要分三支:一支向南由夏桀率领“逃南巢氏”^{[1]19},即迁往今安徽江淮地区的巢湖一带;一支向西北由夏桀之子淳维(獯粥)率领,“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2]2897-2898};另一支向东迁移至齐鲁地区,“止于不齐”而“复徙于鲁”^{[3]380}。有关考古学研究表明,夏商之际的夏遗民在南、北两个方向的迁徙较为清楚,它与中原二里头文化约在第二期偏晚时突然在南方江淮流域的含山大城墩至肥西大墩孜、北方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至河洮地区齐家等地大规模出现相符合,说明文献记载夏遗民奔南巢、北迁匈奴之地是确实可信的^⑤。至于向东迁移,虽在山东地区未发现明显的二里头文化因素,但出土文献明确记载夏桀“出奔三鬲”而“逃之鬲山氏……汤或从而攻之,遂逃,

收稿日期:2019-09-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金文族徽与商周族群认同研究”(17BZS03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雒有仓,男,历史学博士,淮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安徽淮北 235000),主要从事商周考古、先秦史研究。

去之桑梧之野”^⑥。三鬲、鬲山在今山东定陶、德平一带。桑梧即苍梧,指九嶷山,在今湖南宁远南。可见,当时东迁之后的夏遗民应立足未稳,遭受商人多次攻击,最终也辗转迁移至江淮一带。由于他们掌握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也随之传播至东南地区。当然,夏遗民在传播夏文化的同时,也深受土著文化影响,古代学者称之为“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4]92},客观上无疑促进了夏遗民与当地土著居民的族群融合与文化交流。

但是,从今人研究看,学者们似乎过多地关注夏遗民在中原以外地区的族群迁徙和文化交流,对于中原地区的夏遗民与其他族群的迁移融合重视不够。事实上,在商汤灭夏前后,夏朝统治的中心区域仍有大量的夏人居住,而商人也十分注重经略“有夏之居”,一方面促使冀南、豫北、豫东一带的商人部族进入豫西、晋南夏人的原聚落区域并与之融合,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与商结盟的夷人部族,诸如费昌之类“去夏归商”^{[2]174},随着灭夏战争的推进而纷纷入居中原,从而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夷、夏族群迁徙流动。商汤灭夏之后,对于夏族集团“散亡其佐,乃迁姒姓于杞”^{[5]218},即将夏的同盟势力拆散、瓦解,并强行迁徙姒姓贵族至杞(今河南杞县)居住,以便对夏遗民进行监控和弹压。以上这些方面,都是当时民族融合的重要形式。从考古资料来看,早商一期之时,商人先后在豫西建立了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随后在晋南建立了垣曲商城和东下冯商城,并在大量吸收二里头文化基础上融合形成了早商文化的二里岗类型和东下冯类型;到早商二期之时,商族势力大规模扩展,北到冀南的磁县下潘汪,南到黄陂盘龙城,东到豫东的鹿邑栾台等地,都有早商文化分布^{[6]188-197}。这种现象说明,商人对于夏文化当时抱着开放容纳和积极吸收的态度,因而在考古学文化上有融合认同的表现。

根据先秦文献记载,早在夏代中期前后,中原等地广泛分布着夏人国族^{[7]563-608},如斟郟,姒姓,仲康之子封国,都郟城(河南巩义西南),迁于斟城(山东莱州潍县西南);郕,姒姓,少康之子封国,都澶水城(河南荥阳);戈,姒姓,少康之子季杼封国,地在春秋宋、郑之间(河南商丘与

新郑之间);斟灌,姒姓,夏启之子武观的封国,初都观城(山东曹州),后迁斟灌(山东寿光县东北);扈,姒姓,夏启庶兄封国,都于鄆(陕西户县北);有莘,姒姓,夏启别子封国,都莘邑(陕西合阳县),“厥后迁河南陕县以至伊水、郑、汝南、杞、山东莘、曹诸县”^{[8]1170-1175}。越国,姒姓,少康庶子无余封国,都会稽(浙江绍兴),是夏人东南地区重要封国。此外,夏人族群还有许多异姓盟友,如豕韦,彭姓,少康时居韦城(河南滑县东南);昆吾,己姓,都昆吾城(河南濮阳),夏末迁于许(河南许昌东);有虞,姚姓,夏初受封,都虞(山西平陆县东北),少康时居虞城(河南虞城县);有鬲,偃姓,曾与夏遗臣靡拥立少康复国,受封于鬲城(山东德平县东);薛,任姓,夏之车正奚仲的封国,都薛(山东滕县南),后迁于邳(江苏邳县);有仍,任姓,少康之母缙的母亲,封地在汉任城县北(山东济宁);鬲夷,董姓,孔甲时以善于养龙著称,后迁三鬲(山东定陶)。有穷氏,山东地区夷人,曾“因夏民以代夏政”。从以上这些国族的地域和时空分布看,夏人其实很早就与先商部族、夷人以及居住地土著居民等错处杂居,相互之间的族群融合程度和文化交流,应比夏商之际外迁的夏遗民更加长久和深入。

在夏人与其他族群的交流融合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夏代晚期青铜文化的创造与传承。众所周知,二里头文化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开端,目前不仅发现有种类丰富的青铜武器、工具、装饰品近百件,更重要的还有可作为礼器使用的青铜容器如爵、斝、盃、鼎等至少18件^{[6]109}。这些青铜容器的出现,不仅标志着青铜合范铸造技术的发明创造,代表着当时最重要的生产部门和生产力发展的最高水平,而且贯穿着当时的礼制和权力观念——即青铜礼器不仅是贵族用以体现身份地位的用器,同时也是维护等级制度的工具,甚至成为政治权力的象征。所有这些方面,都是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首开其端。然而,从同一时期的先商文化来看,下七垣二期岳各庄类型遗存仅发现铜镞、铜耳环、铜筭各1件^[9],潞王坟一宋窑类型遗存发现有三角形铜刀1件^{[6]161},都属于小件铜器而不能与二里头青铜容器相提并论,说明先商文化的青铜器种类

和铸造技术明显落后于夏代晚期二里头文化。商王朝建立后,在二里岗和郑州商城一期文化遗存发现的铜器品种、数量仍然较少,目前可确定的仅有器壁轻薄的青铜爵;第二期青铜器品种数量增多,有器壁加厚的爵和斝;第三期青铜器品种数量更多,出现了不见于二里头文化的觚、鬯、甗、盘等^{[6]171,173}。这种情况说明,商代早期青铜器明显是在继承夏代青铜铸造工艺基础上,通过借鉴夏遗民青铜铸造技术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商人在沿袭二里头青铜铸造技术的同时,又继承了青铜礼器包含的礼制文化内涵。从商代早期墓葬铜器分为单爵、单斝、爵一斝、爵一斝一盃、爵一斝一鼎等组合形式来看,可知当时以铜器品种数量来体现身份地位与二里头文化一脉相承。有学者认为“龙”是夏族的族徽、图腾,商灭夏后夏遗民向东、南、西北三个方向迁移并将龙崇拜观念传播于各地,所以在山东、安徽、浙江、陕西等地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上常见龙纹图案,且始终未脱离它原有的基本结构^[10]。如果这一看法不误,说明商代中期在青铜器上铸刻族徽的现象,也是承袭夏遗民的文化习俗。

二、商代的夏遗民铜器与周代铜器 铭文中的夏人国族

从夏商之际青铜文化的传承看,现存青铜器中无疑有夏遗民制作的铜器。然而,由于年代久远以及民族融合发展,今天要从商周铜器中区分夏遗民铜器已殊非易事,所以人们常把商代制作的铜器一概视为商人之器而不加区分。但是,从青铜文化传承的实际看,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参照商周之际的青铜文化传承,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讨论夏遗民铜器及其与相关族群的融合认同:一是从考古类型学角度,结合田野发掘资料去认识商代的夏遗民铜器;二是从族姓角度,根据两周金文记载去认识周代的夏人国族;三是从族徽角度,考察夏人后裔铜器及其有关族群关系。以下,先就前两个问题谈一些浅见,后一问题容下节再讨论。

从考古类型学的角度看,形制较早的商代铜器有《西清古鉴》(见《金文文献集成》第四册,

线装书局200年版第216页)卷三十二著录的一件铭“夬”器,口沿有上仰的槽状流,绳索形鬃,三袋足肥大,饰双线人字形纹(见图1)。该器的器形类似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封顶铜盃,与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出土的陶鬯亦接近,故学者或称为“鬯”,认为是夏代东夷族的遗物^⑦;或称为“盃”,认为其时代应属夏代晚期或商代早期^{[11]27}。邹衡先生曾经指出,这种引领伫立的铜器其实就是文献所称的“夏后氏以鸡彝”,完全仿自夏文化的封口陶盃,虽然其渊源可追溯至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出土的陶鬯,但它是夏代青铜礼器的典型器物^{[12]149-157}。这个看法是正确的。我们认为,从平口槽形流的陶鬯晚于斜口管状流的封顶陶盃的情况看,该器不早于偃师二里头文化四期出土的封顶铜盃,应当视为商代早期的夏遗民遗物。另一件形制较早的商代铜器是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藏的亚夬鬯(见图2),该器侈口,双耳,三个乳状袋足外撇,裆部较高,形制与山西汾阳杏花村、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陶鬯以及二里头文化陶鬯十分相似。吴镇烽先生确定该器时代为商代中期。但从形制来看,该器与郑州商城T166M6、T143M1出土的早商青铜鬯差异明显,时代较早,应为商代早期,很可能也是夏遗民的遗物。如果上述看法不误,则说明“夬”和“亚夬”很可能是夏遗民使用的族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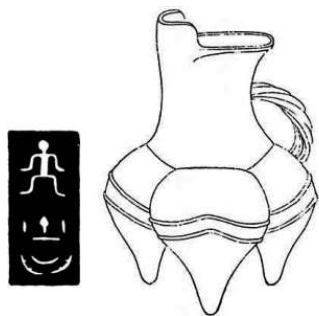









图1 夬盃(西清32.16、铭图14607)




图2 亚夬鬯(铭图续0233)

商代中晚期以来,商文化风格的青铜器已占据主导地位,夏遗民的青铜器已很难区分,但这并不等于夏遗民铜器不能辨识。在青铜器铭文中,多见有关“姁”姓的记载,借此可以了解夏人后裔在商周时期的存在状况。从字形看,商周金文姁字作 (者姁壘) (乙未鼎) (奢簋) (曷姁鬲) (子黄尊) (颂簋) (繁伯武君鬲)等,可厘定为姁、姁、娶、銅、弘(姁)、始、厶(目)。其中,前五种字形多见于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后两种字形多见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兹据青铜器铭文材料,将所见夏人后裔国族整理如下。

1. 杞,姁姓。春秋早期的邾叔豸父簋(集成4592)铭曰:“邾叔豸父作杞孟姁饋簋……”该器铭文“邾叔”为曹姓,受器者“杞孟姁”按周代妇女称名习惯应为邾叔之妻,即“杞”为父氏,“孟”为排行,“姁”为父姓。由此可知,杞为姁姓,其族为夏人后裔。“杞”在甲骨文中见于一、二、五期卜辞有“杞侯”“妇杞”(合集13890、8995白),说明商代中晚期的夏人后裔有自己的封国,曾与商王室通婚。河南开封出土的西周早期亳鼎(集成2654)有“公侯赐亳杞土”的铭文记载,说明“杞土”距离该器的出土地不远,应在河南杞县。然而,西周中晚期史密簋(新收636)载“杞夷”与南夷联合反叛并与齐师交战,说明这时的杞人已由河南开封东迁山东地区。春秋早期,有杞伯每氏所作铜器数件出土于山东新泰县,可证在春秋之前,杞确已迁居山东地区。

2. 虎,姁姓。西周晚期的虎叔簋(新收1611)铭曰:“虎叔作倮姁媵簋……”这是一件媵器,“倮姁”为虎叔之女,据倮仲鼎(集成2462)铭文可知“倮”为媵姓,即其所嫁夫族之称,“姁”为父姓。由此可知,虎为姁姓,其族是夏人后裔。在现存10余件虎族铜器中,虎爵(集成7508)形制为殷墟四期,说明虎族在商代晚期已存在。按甲骨一期卜辞记载,虎当时称“虎方”(合集6667),商王曾“令虎追方”,“虎入百”(合集20463反、9273反),说明武丁时期的虎方听命于商王。西周早期的中方鼎(集成2751、2752)出土于湖北省孝感市,铭文记载“唯王令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

……”说明虎方地处南方湖北孝感一带,是夏末南迁的夏遗民后代聚落,曾与周王室敌对。西周晚期的史密簋(新收636)铭文称“虎”为“南夷”,并说他与盧夷、杞夷、舟夷联合“广伐东国”,该器出土地在陕西省安康县王井沟,可知虎方在西周中晚期已沿汉水北进了。春秋晚期,虎方依附于楚,最终因叛楚而被楚国所灭。

3. 费,姁姓。春秋早期铜器弗奴父鼎(集成2589)铭曰:“弗奴父作孟姁媵鼎……”该器“弗”即费,铭文是费奴父为嫁女作器所记。“孟姁”是费奴父之女。“孟”为排行,“姁”为父姓,“媵”为名或字。据此可知,费为姁姓,其族为夏人后裔。在甲骨文记载中,费作,作人名或族名(合集22246),可知其族自商代已存在。费族铜器目前所见4件,均为西周早期,族名或作“弗”。小孟鼎铭文(集成2839)有“鬲伯”参与册命孟的记载,“鬲”释“酈”即费,说明当时的费已为侯伯之国。从出土地点看,弗奴父鼎出土在山东邹城峰山镇邾国故城,而媵器通常出自女方所嫁的夫家所在地,可知费氏故地距离曹姓邾国不远,应为曲阜东南的费县。

4. 郟,姁姓。春秋早期铜器寻仲匱(集成10266)铭曰:“郟仲媵仲姁子子宝匱,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该器是郟仲为嫁女所作,“郟”即寻,国族名。郟仲之女为“仲姁”,“仲”为排行,“姁”为父姓^⑧,“子子”为名^⑨。由此可知,郟为姁姓,其族为夏人后裔。寻见于殷墟甲骨文称“寻方”(合集27804),说明商代晚期寻为方国。但郟氏铜器少见,仅有郟伯匱(集成10221)、郟公遂戈(铭图续1214)等4件,从铭文“郟伯”“郟公”之称可知,西周晚期的郟国仍然存在。春秋初年,齐桓公赐“郟之民人都鄙”作为鲍叔牙采邑(鞌罇,集成271),说明郟已被齐所灭。

5. 繁,姁姓。春秋早期铜器繁伯武君鬲(新收1319)铭曰:“繁伯武君媵出姁宝鬲……”“繁”即繁,国族名。该器是繁伯为嫁女所作媵器。“出姁”为繁伯武君之女。“出”为夫氏,“姁”为父姓。由此可知,繁为姁姓,其族为夏人后裔。在现存5件繁氏铜器中,繁簋(集成4146)形制较早,时代为西周早期,铭文有公命曷伯“蔑繁历”,说明其族西周初年已受封。另一件

铜簋(集成3770)记载“降人繁作宝簋”,“降人”见于询簋(集成4321)为师询所辖虎臣之附庸,可知西周早期的繁氏为卫国的附庸国,受康叔册封,居于卫地。

6. 戈, 姒姓。西周中期铜器繁彝(集成9822)铭曰:“**繁**作祖己尊彝,其子子孙永宝,戈。”这是繁氏为祖己所作祭器。“**繁**”同“**𣪠**”即繁,“戈”是繁氏的族徽。由繁为姒姓,可推知戈亦姒姓,正与《史记·夏本纪》所载相合,说明其族为夏人后裔无疑。戈族铜器共230余件,多数为商代晚期,少数为西周早期,个别为春秋早期,可知其族自商代一直延续至西周、春秋时期。戈族铜器在河南、陕西、湖北等地都有发现,其中商代器多见于河南安阳地区,西周早期器较集中的出土于陕西泾阳高家堡。这种情况说明,戈族在商代晚期居住在安阳附近,周初聚居在泾阳高家堡。

7. 辛, 姒姓。西周晚期铜器叔向父簋(集成3849-3855、近出461)铭曰:“叔向父作姒尊簋……”该器主“叔向父”名禹,见叔向父禹簋(集成4242)。据禹鼎(2833、2834)铭文“命禹肖朕祖考,政于井邦”,可知禹为一代井叔,姬姓。按周代有同姓不婚之制,受器者“姒”为姒姓女子,可知她是叔向父之妻,“姒”同“辛”,即为父氏。由此可知,辛为姒姓,其族为夏人后裔。辛族铜器目前所见共14件,时代多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其中一件出土于河南洛阳,说明其族自商至周犹存,居住地可能在洛阳附近。

8. 山, 姒姓。西周早期铜器辛史簋(铭图5023)铭曰:“六月初吉癸卯,伊**𣪠**祉于辛史,伊**𣪠**赏辛史秦金,用作父尊彝,山。”这是辛史在某仪式上因接引伊**𣪠**而得其赏赐作器。作器者为辛史,“辛”为氏名,“史”为官称^⑩,铭末所缀“山”为辛氏族徽。由前述辛为姒姓,可知山亦姒姓。山族铜器所见近40件,多数为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器,个别为西周中期,出土地除商代晚期的山丁爵(考古2009.9)为河南安阳孝民屯外,其余多见于陕西长安张家坡、宝鸡纸坊头、岐山京当贺家村等地。这种情况说明,山族在商代晚期居住于河南安阳殷墟,西周早期迁移至陕西长安县至宝鸡一带居住,其族一直延续至西周中晚期。

9. 𣪠, 姒姓。西周早期铜器季姒簋(集成3557)铭曰:“季姒作用簋,𣪠。”年姒簋(集成3579)铭曰:“年姒作用簋,𣪠。”以上两器的铭文格式、年代相同,所署族徽均为“𣪠”,说明二者是同族。前者“季姒”应为“排行+姓”,后者“年姒”应为“字+姓”。由此可知,季姒、年姒所在的𣪠族为姒姓,应为夏人后裔。𣪠族铜器目前所见共有30余件,时代多为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个别为西周中晚期。其中,𣪠爵(铭图6402)形制最早,时代为商代早期,出土地点在郑州杨庄,说明这里很可能是𣪠族的最初活动地。另有3件出土于浚县辛村(今属鹤壁市淇滨区),时代较晚,说明其族曾迁居河南浚县辛村附近。




10. 鲍, 姒姓。春秋晚期铜器鲍子鼎(铭图2404)铭曰:“**𣪠**子作媵仲甸姒鼎……”“**𣪠**”即鲍,该器为鲍氏嫁女所作媵器。“仲甸姒”是鲍氏之女。“仲”为“排行”,“甸”为名或字,“姒”为姓。由此可知,鲍为姒姓,其族为夏人后裔。鲍氏铜器所见仅3件,其中春秋中期的**𣪠**罍(集成271)铭文有皇祖“鲍叔有成勞于齐邦,侯氏赐之邑”的记载,说明鲍氏兴起在春秋初期齐国。春秋晚期铜器鲍氏钟(集成142)铭文载有“齐鲍氏”之孙自作**𣪠**钟,可知鲍氏其族延续至春秋晚期。




除上述姒姓的夏人后裔外,两周金文中还有一些族姓不同的族氏,如妊姓之薛、史(集成10133、2377),改姓之苏、番(集成2382、9705),都与夏人有历史渊源。薛,原本为夏之车正奚仲的封国(山东滕州南),商代滕州前掌大墓地出土有许多铭“史”铜器,应为古薛国后裔遗物。苏,为祝融八姓之一,传至商代有苏氏,《国语·晋语》载:“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妘己女焉。”西周晚期的苏甫人匜(集成10205):“苏甫人作姒改襄媵匜。”苏公簋(集成3739):“苏公作王改羞簋。”可证“苏”为“改”姓。“改”就是文献中的“己”,《国语·郑语》谓“己姓,昆吾、苏、顾、温、董”。刘师培先生考证,己、姒为一姓之分,“己姓通作姒姓,盖古代己吕二字音形义均相同,故多通用”^⑪。按照这种说法,己姓之苏应为夏人后裔分支。此外,青铜器铭文中还有一些可以确定族姓的国族如妘姓之陈、姜姓之鄆、妊姓之铸^⑫,均属夏代存在的古帝王之后。从有关铜




器的出土地点看,商周时期的夏人后裔铜器在晋南、豫西出土较少,在河南中东部、山东及南方江淮地区出土较多,关中地区也有发现。这种情况说明,商周时期的夏人后裔分布虽然较分散,但主要见于中原、山东和江淮地区。




三、夏人后裔铜器族徽与所见商周族群的融合认同

从夏人后裔的铜器数量看,姒姓国族铜器现存350多件,同为一姓之分的改姓国族铜器现存40件,二者合计390件。由此可见,在通常所说“商周铜器”之中,确有夏人后裔制作的铜器。如果我们把这些铜器单独加以观察,就会发现夏人后裔也使用族徽,而族徽的使用大多数是商人族群。这无疑有助于深入认识夏商族群的融合认同。现将夏人后裔的铜器族徽整理如下。

1. 目,常见作、、,是较早出现的族徽,多单独铭刻,复合式有“目邦”、“目中”、“目涪”、“目子弓箠”(集成4880、6933、8229、5142)。

2. 戈,常见为立戈形,一种内无垂饰作、、。二者多见单独铭刻或与父祖日名连缀,含义与“戈作旅彝”或“戈作父丙彝”(集成3384、5798)相同。戈为商周时期大族,常见与其他族徽组合,如“戈天”、“戈𠄎”、“宁戈”、“守戈”、“戈毫册”、“北單戈”、“戈卂甲宁”(集成8142、797、839、8236、3237、1747、8787)等。

3. 辛,常见作、、、,多单独铭刻(集成450、989、6017、7671、7672),含义与“辛作宝彝”(集成1987、5116、5784)相同,有时作“亞辛”或“戈辛”(集成7844、6154),说明其族与戈族关系密切。



4. 虎,常见为虎形,一为虎缓步行走貌如、,一为虎屏气奔跑状如 (集成2974),含义取虎之勇猛、迅疾,来源可能与商代晚期官称“虎楯”(集成5147)有关^[13],其族在西周时期可能为虎臣,是因官为氏的族称。

5. 山,常见作、、,多与父祖日名

连用或单独出现,含义与“山作父乙尊彝”(集成10568)相同,或作“犬山”、“山口”(集成8866、9232)。

以上五种族徽,已见前文引述。以下两种族徽,尚需证明其为夏人后裔。

6. 𠄎,常单独铭刻或见于铭文末尾,如陕西泾阳高家堡西周墓出土的铜卣铭“戈𠄎”(集成4854)。西周早期的姒簋(铭图4412):“姒作父乙宝尊彝,𠄎。”按女子称姓之制,该器主为姒姓女子,族徽为𠄎,可知𠄎亦姒姓,为戈的分族。

7. 𠄎,作,常与“旅”合署为(集成6167),多见于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器,常单独出现或在铭文之尾。1988年陕西延长县安沟乡岔口村西周墓出土的苏鬲壶(近出967):“苏鬲作壶,鬲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𠄎。”由前述苏为改姓,可知𠄎亦改姓。按刘师培之说,其族与姒同出一源,为夏人后裔。

以上七种族徽都是族氏名号,分别代表不同族群,有些与前述夏人国族名称一致,有些不一致。相比较而言,费、郟、鲍、番未见作为族徽使用,杞因早期铜器发现较少而不能肯定其是否用为族徽。这种情况说明,在夏人后裔中,并非所有国族都使用族徽。从作器者性别看,使用族徽的既有男性,也有女性。从族姓看,使用族徽的有姒姓之戈、目、虎、辛、山、𠄎,改姓之𠄎。从时代看,夏人后裔族徽多出现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少数出现在西周中晚期,个别见于春秋早期。其中,时代最早的是河南郑州杨庄出土的目爵(河铜1.60),盞两侧腹部铸有双目形,与《说文》从二目之“目,左右视也”相合,释“目”^⑧。该爵长流、尖尾、平底、三棱形锥足、扁平盞,形制与二里头文化三期出土的铜爵相似,时代应为二里岗下层^[14]。这个事例说明,商代早期在铜器上铸刻族徽,很可能是源于夏人传统而被商人所沿袭。我们知道,族徽是氏族名称,在商代最流行,其见于铜器主要是为了标明器物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但同时也是单一族群血缘观念和集体身份的体现。在商周时代,夏人后裔与商人都在铜器上铸刻族徽,这实际上就是夏、商二族在文化上认同的表现。

除族徽外,夏人后裔铜器铭文也常见使用日名,例如:“𠄎父乙”“虎父庚”“弗祖辛”“戈妣

辛”“山父丁”“𠄎亞祖癸”“苏公子癸父甲作尊簋”“繁作祖戊宝尊彝”“仲辛父作朕皇祖日丁、皇考日癸尊簋”(集成 6225、1629、8346、1515、7115、1816、4014、4146、4114)等。这类铭文数量较多,使用范围明显比族徽普遍,所见族氏既有姒姓之虎、费、戈、山、𠄎、繁、𠄎,也有改姓之苏、牵等,时代从商代晚期一直延续至春秋早期,其中以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居多,春秋早期仅见于个别铜器。整体而言,夏人后裔姒姓各族氏使用日名较多,改姓使用日名相对较少。我们知道,使用日名的现象早在夏代就已经出现,见于《史记》记载的有夏帝孔甲、帝履癸以及殷商先公报丁、主壬等。因此,夏人后裔与商人一样普遍使用日名,应当是夏、商族群很早在文化上融合的表现,而日名在西周中晚期渐趋消失,应当是夏、商后裔对周人不用日名的文化认同。除日名外,文化认同还体现在丧葬习俗上,典型如山东滕州前掌大“史”族墓地和陕西泾阳高家堡“戈”墓地的多数墓葬都有腰坑和殉狗,出土铜器的种类多见爵、觚、尊、卣、觶等酒器,而陶器则以高柄豆、侈口折肩罐与殷墟陶器风格最相似。这是夏人后裔与商文化认同在考古材料中的物化表现,表明商末周初的夏商族群已基本融为一体化了。

在夏人后裔铜器铭文中,常见有族氏通婚记载(见附表)。这种情况已见于前引虎叔簋、弗奴父鼎、寻仲匜、繁伯武君鬲等媵器铭文。此外,在一些常用器如邾叔父簋,宗庙祭器如叔向父簋铭文中也有反映。从时代看,最早反映商代夏遗民通婚的材料,目前所知有3件:一是西周中期的班簋(集成 4341)铭文“毓文王、王姒圣孙登于大服”,其中“王姒”即文献记载的太姒,她是姒姓莘国之女,嫁于周文王为妻,可知这是商末有莘氏与周王室之间通婚;二是商代晚期的杞妇卣(集成 5097),盖、器同铭“亞醜杞妇”四字,其中“杞妇”与甲骨文“某妇”之称相同,属于“夫国或夫氏+妇”形式,其身份为杞国某贵妇,由于她是从“亞醜”族嫁来的女子,故称“亞醜杞妇”,说明这是商代晚期杞国与亞醜氏通婚^⑤。三是新见商代晚期的妇姒啟鼎(铭图续 046),内壁铸“妇姒啟”三字,其中“妇姒”与甲骨文“妇杞”、“妇妊”(合集 8995 白、2799)类似,属

于“妇+父氏或父姓”形式,其身份为姒姓某妇,由于她嫁给子姓商族啟氏为妻^⑥,故称“妇姒啟”,可知这是商代晚期姒姓夏人后裔与商王室贵族之间通婚。

根据西周早期铭文记载,夏人后裔与周王室通婚较多(见附表)。在山东济阳刘台子村出土的王姒鼎、河南洛阳马坡村出土的叔𠄎方彝以及传世的寓鼎(近出 308、集成 9888、9646)铭文中,都有“王姒”赏赐、作器的记载。“王姒”指姒姓女子嫁于周王为妻者,各器所载赏赐对象、受器者以及土地各不相同,说明这是来自不同地区的姒姓女子与周王通婚。与此不同,西周中期未见“王姒”但有“芮姒”、“彘姒”赏赐、作器的记载(铭图 14514、集成 2193、3567),说明这一时期的夏人后裔多与周王室以外的贵族通婚。西周晚期,既有“王姒”赐贝、王作“番改”鬲,也有苏公作“王改”簋等记载(集成 9646、645、3739),说明这一时期的夏人后裔仍与周王室通婚频繁,其中既有姒姓,也有改姓。西周早期的覲公簋铭文说:“覲公作妻姚簋,遣于王命唐伯侯于晋。”“覲公”按铭文末尾所署族徽“𠄎”应为姒姓,其妻以姚姓为称,应为有虞氏之后,可知这是姒姓夏人后裔与姚姓贵族通婚。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新出土的柯史簋载“柯史作唐姒媵簋”,“唐姒”是嫁往唐国的姒姓女子,说明柯为姒姓,这是姒姓柯氏与姬姓唐国通婚^⑦。西周中期的芮公叔盤(铭图 14514)说:“芮公赐贝百朋、芮姒赐贝卅朋”。“芮公”为姬姓芮国国君,“芮姒”应为姒姓芮公之妻,可知这是姒姓夏人后裔与姬姓诸侯通婚。西周晚期,铭文既有“卫姒”、“会姒”、“密姒”、“翟姒”作器,也有苏公作“晋改”匜、叔史小子殺作“寒姒”鼎等记载(集成 594、536、4522、新收 672、1916、2598)。卫、晋都是姬姓,会、寒为妘姓,密为姁姓,说明这一时期的姒姓夏人后裔与异姓贵族通婚较多。春秋时期,能够反映夏人后裔通婚的铭文分两类:一类如“杞伯每氏作邾曹宝簋”(集成 3897-3902),属丈夫为妻子作器,说明这是姒姓杞国与曹姓邾国通婚;另一类如“苏公作仲改媵匜”(新收 1465),属父亲为女儿作器,铭文省略了出嫁女子的夫家信息,仅知其父国族与姓,但因有“媵”字,仍可知这是改姓夏人后裔与某族氏通婚。

我们知道,不同族氏之间的通婚,可以打破彼此血缘上的封闭空间,促进族际族之间的交流和人口流动,使不同血缘的族氏产生亲属联系,所以它是实现族群融合与认同重要手段和途径,也是一个民族最终得以形成的基础。在华夏族的形成过程中,商周时期的夏人后裔分别与商族、周族都有通婚关系,从而使夏遗民先后融入了商人和周人族群,实现了对社会构成新秩序的不断调整和充实。从青铜器铭

文显示的信息看,夏人后裔与商族的融合主要表现为族徽与日名文化习俗上的相互认同,而与周族的融合更多的表现为以通婚实现了彼此血缘上的融合(见附表)。夏商周三族最终融为一体是在春秋早期,其明显标志就是体现单一家族组织的族徽在这一时期销声匿迹。显然,这种情况既是夏商周三族后裔相互融合认同的直观反映,也是华夏族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附表 商周青铜器铭文所见夏人后裔通婚统计

序号	通婚国族 (女-男)	时代	女 姓	夫 姓	铭文主要内容	出土地	器名	资料来源
1	杞—亞醜	商代晚期	姒	?	亞醜杞妇		亞醜杞妇卣	集成 5097
2	杞—邾	春秋早期	姒	曹	邾叔豸父作杞孟姒饋簋	山东平邑县东 阳乡蔡庄	邾叔豸父簋	集成 4592
3	邾—杞	春秋早期	曹	姒	杞伯每氏作邾曹宝鼎	山东新泰县	杞伯每氏鼎	集成 2494-95
4	虎—棚	西周晚期	姒	媿	虎叔作棚姒媿簋		虎叔媿	新收 1611
5	费—?	春秋早期	姒	?	弗奴父作孟姒宥媿鼎	山东邹城纪王 城村邾国故城	弗奴父鼎	集成 2589
6	郛—?	春秋早期	姒	?	郛仲媿仲姒子子宝匜	山东临朐县嵩 山乡泉头村	寻仲匜	集成 10266
7	繁—卬	春秋早期	姒	?	繁伯武君媿卬姒宝鬲	安徽宿县谢芦 村	繁伯武君鬲	新收 1319
8	辛—井	西周晚期	姒	姬	叔向父作辛姒尊簋		叔向父簋	集成 3849-55
9	鲍—?	春秋晚期	姒	?	鲍子作媿仲匜姒鼎	2008年见于西 安	鲍子鼎	铭图 2404
10	莘—周	西周中期	姒	姬	毓文王、王姒圣孙登于大 服	原藏清宫	班簋	集成 4341
11	覯—?	西周早期	姒	姚	覯公作妻姚簋		覯公簋	考古 2007.3
12	?—萁	西周早期	姒	?	萁姒赐商贝于姒	河南辉县	萁姒觚	集成 7311
13	?—萁	西周晚期	姒	?	作朕皇考萁叔、皇母萁姒 宝尊鼎		颂鼎	集成 2827-29
14	?—周	西周早期	姒	姬	叔餽赐贝于王姒	洛阳马坡村	叔餽方彝	集成 9888
15	?—周	西周早期	姒	姬	王姒作龍媿宝尊彝	山东济阳刘台 子	王姒鼎	近出 308
16	?—周	西周晚期	姒	姬	王姒赐保侃母贝		保侃母壶	集成 9646
17	?—周	西周早期	姒	姬	王姒赐寓曼丝		寓鼎	集成 2718
18	柯—唐	西周中期	姒	姬	柯史作唐姒媿簋	河南平顶山北 滎村应国墓地	柯史媿	华夏考古 2015.3
19	?—芮	西周中期	姒	姬	芮公赐贝百朋,芮姒赐贝 卅朋	2010年见于西 安	芮公叔盘	铭图 14514
20	?—翏	西周中期	姒	?	翏姒作宝尊彝	河南浚县辛村	翏姒鬲	集成 2193

续附表

序号	通婚国族 (女-男)	时代	女 姓	夫 姓	铭文主要内容	出土地	器名	资料来源
21	?—彘	西周早期	姒	?	彘姒作宝尊彝	河南洛阳	彘姒簋	集成 3567
22	?—卫	西周中期	姒	姬	卫姒作宝尊簋		卫姒簋盖	集成 594
23	?—卫	西周晚期	姒	姬	卫姒作鬲以从永征		卫姒鬲	集成 594
24	?—会	西周晚期	姒	妘	会姒作媵鬲		会姒鬲	集成 536
25	?—密	西周晚期	姒	姑	密姒作旅匡	陕西扶风庄白村二号窖藏	密姒簋	集成 4522
26	?—寒	西周晚期	姒	妘	叔史小子殺作寒姒好尊鼎		小子殺鼎	集成 2598
27	?—翟	西周晚期	姒	?	翟姒作善尊簋	陕西周至哑柏镇	翟姒簋	新收 672
28	?—啟	商代晚期	姒	?	妇姒啟	2015年见于南京	妇姒啟鼎	铭图续 046
29	薛—?	西周晚期	妊	?	薛侯作叔妊襄媵盘		薛侯盘	集成 10133
30	苏—?	西周晚期	改	?	苏甫人作姪改襄媵匡		苏夫人匡	集成 10205
31	苏—虢	春秋早期	改	姬	苏冶妊作虢改鱼母媵		苏冶妊鼎	集成 2526
32	苏—周	西周晚期	改	姬	苏公作王改孟簋		苏公簋	集成 3739
33	苏—晋	西周晚期	改	姬	苏公作晋改盘 苏公作晋改匡		苏公盘 苏公匡	铭图 14404 新收 1916
34	苏—?	西周晚期	改	?	苏甫人作姪改襄媵盘 苏甫人作姪改襄媵匡		苏甫人盘 苏甫人匡	集成 10080 集成 10205
35	苏—?	春秋早期	改	?	苏公作仲改媵匡	上博购自香港	苏公匡	新收 1465
36	番—周	西周晚期	改	姬	王作番改齐鬲		王鬲	集成 645
37	番—?	西周中期	改	?	番刍生铸媵壶,用媵卣元 子孟改乖		番刍生壶	集成 9705

注释

①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②李民:《夏商史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郑杰祥:《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夏商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93—293页。孙庆伟:《鼎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③曹定云:《古文“夏”字考——夏朝存在的文字证据》,《中原文物》1995年第3期。葛英会:《夏字形义考》,《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1期。李维明:《“夏”字形探源》,《郑州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1—63页。④有关夏遗民研究主要见于李民、张国硕:《夏商周三族源流探索》,河南

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杜金鹏:《夏商周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李龙海:《汉民族形成之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⑤杜金鹏:《试论夏商之际的民族迁徙与融合——关于九州“禹迹”的考古学研究》,《郑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杜金鹏:《夏商文化断代新探》,《中原文物》1993年第1期。⑥分见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14页;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容成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81页。⑦邵望平:《陶鬻的启示》,《文物》1980年第2期。安志敏:《试论中国早期铜器》,《考古》1993年第12期。李先登:《试论青铜鬻》,《中原文物》2008年第4期。⑧“姒”原篆作女下C形,前人多误释“女”或“女丁”,如孙敬明先生认为该字是“未完成的𠂔字上半部”,释“女”(孙敬明、何琳仪、黄锡全:《山东临朐新出铜器铭文考释及有关问题》,《文物》1983年第12期),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学者则释为“女丁”(《殷周金文集成释文》10266)。⑨“子

子”，李学勤先生认为即指次女，见氏著《试论山东新出青铜器的意义》，《文物》1983年第12期。陈絜先生则将“姒”之女王C形与“子子”合观，释为“吕子”，见氏著《鄂氏诸器铭文及其相关历史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2期。^⑩此器《集成》10582及《释文》误称为“伊器”，《铭图》释“史”为“吏”。^⑪刘师培：《氏姓学发微》，《刘申叔先生遗书·左盒外集》卷十，1936年宁武南氏排印本，第2页。^⑫分见陈侯簋、许男鼎、铸公簋盖（集成4603、2549、4574）。^⑬有学者认为该爵腹部双目形是纹饰而不是文字。其实，该器背面另有兽面形纹饰。一般来说，纹饰与文字的主要区别是：前者连续出现，而后者只见于器物某特定部位。该爵的双目形仅见于爵腹，而爵腹铸铭也较常见，如父乙爵、御正良爵、尸爵（集成8881、9103、铭图8549）等腹部都铸刻有文字，因而将该爵腹部双目形视为族徽文字，释为“眚”，更为合理。^⑭“亞醜”族墓地在山东青州东北苏埠屯村，距离杞国不远。参见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州市博物馆：《青州市苏埠屯商代墓葬发掘报告》，《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54-273页。^⑮“啟”即子啟，见啟尊（集成5965）铭文：“子光赏于啟贝，用作文父辛尊彝。龔。”可知其族属为子族，族徽为龔，身份为王室贵族族长。^⑯关于应国墓地“唐”的族姓：一说为山西境内祁姓唐国，见河南省考古研究院、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M257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5年第3期；一说为山西境内姚姓唐国，见王正、雷建鸽《柯史簋与柯国、唐国》，《中原文物》2015年第5期；一说为南方江淮流域姬姓唐国，见黄锦前《应国墓地M257出土考古史簋读释》，《出土文献》第十一辑，2017年第2期；当以后说为是。

参考文献

- [1]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2]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3]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殷祝解[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 [4]王先谦.荀子集解·儒效[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 [5]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少间[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7]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国爵姓及存灭表[M].北京:中华书局,1993.
- [8]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9]拒马河考古队.河北易县涑水古遗址试掘报告[J].考古学报,1988(4):421-454.
- [10]王克林.从出土文物看夏遗民的迁徙[J].考古与文物,2001(2):48-53.
- [11]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26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12]邹衡.试论夏文化[M]//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 [13]雒有仓.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综合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
- [14]曹淑琴.商代中期有铭铜器初探[J].考古,1988(3):246-257.

Identities and Fusion Between Xia's Descendants and Shang and Zhou Ethnic Group Seen from the Armorial Inscription on Bronze

Luo Youcang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ethnic migration and fusion during the the replacement of Xia and Shang Dynasties, people of Shang not only followed the casting technology of clay molds for bronzes created by the Xia people, but also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bronze-based rituals and the custom of engraving armorial inscriptions. In bronze inscriptions, the descendants of Xia people were mainly from ethnic groups of Qi(杞),Hu(虎),Fei(费),Xun(郚),Fan(繁),Ge(戈),Xing(辛),Shan(山),Qu(瞿),Bao(鲍),Su(苏) etc.among which six armorial inscriptions including Qu(瞿),Ge(戈),Xing(辛),Hu(虎),Shan(山) and Wu(𠄎) have been identified. The fusion of Xia descendants with Shang people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armorial inscription, the naming system by birth-day (tian gan di zhi) and funeral customs, while the fusion with Zhou people was basically realized through marriage. The complete integration of three ethnic groups is the vanishing of single armorial inscription in the early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Key words: Xia descendants; the armorial inscription on bronze; ethnic identity

[责任编辑/原 孟]